

中国近代史丛书

戊戌变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戊戌变法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戊戌变法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375 字数 46,200

1972年7月第1版 197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1·204 定价: 0.13元

毛主席语录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

毛主席语录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我们编写这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重要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目 录

- 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出现····· 1
- 二、康有为最初的活动····· 6
- 三、走向政治改良运动····· 11
- 四、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 19
- 五、死抱住一个皇帝····· 31
- 六、围绕着保国会的斗争····· 40
- 七、一百零三天的新政····· 47
- 八、顽固派发动政变····· 55
- 九、走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 64

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出现

一八九八年中国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政治运动——戊戌（音物须 wùxū）变法。这次运动也叫戊戌维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特别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尖锐的矛盾下产生的。

那时候的中国，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一次又一次打败，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中法战争，又发生中日甲午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或十几年，资本主义侵略者就要对中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它们一次又一次地迫使清朝政府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把独立的中国变为由它们宰割的半殖民地。

这些资本主义侵略者，就是英国、法国、美国、沙俄、德国和后起的日本等等，一个一个闯进中国，横行霸道，凭借不平等条约，一面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无孔不入的侵略，一面又侵占中国周围的邻邦作为基地，把魔爪伸入中国的边疆。从海上到陆上，从东北到西南，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它们更在“利益均沾”的借口下，不但

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办工厂，筑铁路，开矿山，设银行，争夺贷款，大量输出资本，摧毁中国社会经济的每一个堤岸，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并且纷纷强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准备瓜分中国。

资本主义侵略者这种无止境的侵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反抗。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虽然被清朝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下去了，但是中国人民的反抗并没有一天停止。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地会党以“打富济贫”、反洋教相号召，开展了此伏彼起的群众斗争。到九十年代，城市贫民和乡村农民的抗捐抗税斗争，遍及全国十多个省份，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更连绵不断地掀起反洋教斗争的巨浪。其中四川余栋臣的起义，发布檄（音习 xí）文，痛斥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英勇抗击清军的围剿，影响达到三十多个州县，标志着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在向更大的规模发展。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震惊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到中法战争的八十年代，已逐步汇合成为一股怯懦的改良主义思潮。

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产生而出现的。在七、八十年代，沿海各省先后开办了五十个左右的近代企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员，逐步向资产阶级转化，他们开始感到光凭儒家学术和八股文一类旧学问，已不能适应新的

环境,想从中挣扎出来,探讨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向西方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的方案,以实现他们解救民族危难和缓和社会矛盾的愿望。他们不甘心帝国主义的奴役,要求自强。他们也耽心清朝政府将被日益扩大的群众反抗风暴淹没,主张通过革新把它拯救出来。这表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刚以新的姿态出场,在忠诚救国的宣言下,就掩盖着麻痹人民和欺骗人民的作用。

向西方学习,是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课题。但那时的中国人,能到外国直接接触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只有极少数外交官和留学生。国内知识界的西学来源,除了得自这极少数人的辗转传闻外,主要依靠这样几个方面:一、一八六二年清朝政府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员,也译述一些以“公法”为主的外国书。所谓“公法”,是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法规。二、一八六五年洋务派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译述洋务工业必需的技术知识,也有少量政法方面的书。三、为了侵略的需要,窜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很早就出版书报,散布麻痹中国人民的“基督文明”。一八八七年,英美传教士在上海设立的广学会,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文化侵略机构,发行了《万国公报》,出版了一百多种书,主要是宗教书,也有一些是从殖民主义要求出发的政法、历史书。这些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能取得的西学资料。他们从这些书刊中,吸取了有关声、光、化、电的粗浅科技知识,也从中获得了一些国际形势和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

在改良主义思想酝酿的过程中,最早较明显地提出这种

主张的，是广东的容闳。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首倡者，自称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就是说要按照资本主义的面貌来改造中国。他回国后，到太平天国访问，向洪仁玕提出过革新意见。在六十年代，又多次向清朝的洋务派官僚兜售他的改良建议，想依靠一种政治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改良主张。其后较有名的有王韬（音掏 tāo）、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在八十年代前后，写书、写文章，发挥变法言论，在知识界形成为一股缓慢的思潮。这些人属于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大都同洋务派官僚有很深的关系，也同外国传教士有密切的来往。但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以抵制资本主义的侵略，认为洋务派专搞“制造”，只是西学的皮毛，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少采取了一点批评的态度。这就使他们不同于顽固守旧的士大夫，也有别于洋务派官僚和买办。

譬如郑观应这个人，早年就放弃了读书赶考的道路，投入商界，为洋务派经办过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一类企业，是一个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他自己说是“触景伤时，略陈利弊”，于一八六二年出版了《救时揭要》一书，一八七一年增删为《易言》，一八九三年又增订改名为《盛世危言》发行。因此，前后经过三十年才完成的《盛世危言》，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书，反映了甲午战争前改良主义思潮的全貌，也基本上概括了那个时期这批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在贫乏和饥荒的知识界中，还流行这部书。

他们在这一类书中，强调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中国不

能守着老样子不变,相信“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但只能由渐而变,一点一滴地变,不能变得太猛太急。他们相信事物是变的,这一点是对顽固派永恒不变思想的否定;但他们只看到点滴的量变,不承认事物的质变,这就又使自己滚进了对抗革命的泥坑。他们的主张:一、要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只有兼采西学,变法自强,才能改变被侵略的地位,因此揭露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危害。但是他们以为只要“自强”起来,帝国主义就会停止侵略,就会从中国撤走,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二、要求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提倡“民间自立公司”,提倡“富人出其资,穷人出其力”的资本主义剥削,提出“商战”的口号,同外国资本主义竞争。三、把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划分为君主专制、民主共和、君民共主三种,认为君主专制君权太重,民主共和太偏激,只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政治)最“合适”。新起的资产阶级,满想通过这种药方来挽救民族危机,缓和阶级矛盾,从而改变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使自己成为当权的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这些软弱的表示,也就是后来戊戌变法所要努力实现的基本内容。

二、康有为最初的活动

作为维新变法运动主角的康有为，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酝酿的后期，就已开始活动。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深受儒家教育的熏陶。他早年去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读了些介绍西学的书，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治国的办法，不能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因为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反过来看清朝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却是那样古老闭塞，老被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处境一天比一天坏。这样，康有为的革新思想产生了，他把学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真理。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当时正当中法战争后不久，不仅一些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邻邦，如越南、缅甸、锡金已被英、法侵占，而且英国又在发动侵略中国边疆西藏的战争，俄国在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中国西北的大片土地后，进而窥伺中国东北等地区，日本也在向中国东北亲密邻邦朝鲜步步进逼。康有为看到这

般情景，写了封五千字的上皇帝书（第一书），去叩紫禁城的大门。书中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已从侵占邻邦、伸入边疆，进而达到深入内地的危险局面；人民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到处是“骚乱”，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将会再次爆发。他认为在这个时候赶紧变法改良，还可以挽救危局，要是再迁延下去，就不堪设想了。这是康有为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正式建议的开端。

这封上皇帝书，不过是一个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向地主阶级总头目——皇帝的出谋献策，表达了一点资产阶级的改良愿望而已。在顽固守旧的官僚们看来，一个毫无地位的书生，竟敢向皇帝大发议论，实在不象话，不愿把书送给皇帝。本来，康有为在这次乡试中，已被内定为考中的第三名。主考官顽固派徐桐，对康有为的上书很反感，大骂“如此狂生”，不予录取。康有为落选了，但是，他经过这次上书，却渐渐有了声名。

康有为见他的建议书没有送到皇帝那里，曾写下“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的诗句。就是说这次向皇帝上的“治安”建议，明知很难上达，是失败了，但他这个在野的知识分子并不因此灰心，还要加油干。他回到广东，招收学生讲学，于一八九一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名叫“万木草堂”的学馆。他写了《长兴学记》，开始发挥他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先后来到这里学习。梁启超出身于地主家庭，这时已经是年少的举人，却来拜还没有考上举人的康有为为师。梁启超渐渐放弃专搞科举考试的那一套，扩大学习领域，学习经学、理学、史学和西学，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成为

康有为的主要助手，被人们合称为康、梁。

万木草堂开始只有二十多个学生，一八九四年达到一百多人，是康有为培养助手、制造维新理论的场所。据说因为康有为反对八股文，学生受了他的影响，不愿参加科举考试。家长大不高兴，说不参加科举考试还读什么书？他们以不给学费来要挟自己的子弟。康有为转而力劝学生向八股文投降，说“我且考过，诸君何妨勉力为之，以慰父兄之心呢”！

康有为在广州的这几年中，一边教学，一边著作，为了使变法主张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得到共鸣，写了不少书，着力引伸和附会孔子的学说，作为变法理论的依据。其中有两部书在思想界产生过震动，对戊戌变法的影响最大，一部是一八九一年写成的《新学伪经考》，一部是一八九二年开始写起、几年后才完稿的《孔子改制考》。

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作“六经”。经就是经典的意思，相传都是经过孔子编订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到西汉末，因为发现了一批儒家经传，是用篆书一类的古文字写的，同那时用隶书写的通行的本子有所不同，从此产生了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康有为想引用经传，编造变法理论，来开展他的政治活动。他的《新学伪经考》就是要打倒古文经，树立今文经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使变法改良主张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找到依据。他多方论证，古文经是刘歆（音心 xīn）帮助王莽篡夺汉朝刘家的天下，而伪造出来的，所以他叫古文经为“新学”，是王莽的“新”朝之学，是刘歆捏造的伪经，不是孔子的真经。这样，他公然把

历代奉为神圣的孔子经书的一部分说成是假货，就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古代的经典，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动摇，在客观上也打击了死守“祖宗家法”的顽固势力。因此，这部书一再遭到清朝政府的禁毁。

《孔子改制考》，发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托古改制就是把自己设想要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行过，借以争取人们的信服。康有为认定孔子就是一个托古改制的大家，孔子著作的六经是托古改制的范本。康有为想用这些证明自己的变法主张是合理的，是对孔子的托古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这些议论也和《新学伪经考》一样，遭到了顽固派的骇怪和反对。但是，《孔子改制考》的许多论证，确是极为荒谬的。譬如，六经本来是长期累积、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顶多经过孔子的整理删订，康有为却硬说都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写出来的。这样一来，连包括大量民间歌谣的《诗》经这样一部古代诗歌作品选集，也都成了孔子个人的创作。为了把孔子神秘化，甚至用一些荒唐无稽之谈附会起来，说孔子是什么上天降精的黑帝（神），所以是“大圣人”、“大救世主”，而他康有为又是最能获得孔子真传和最崇敬孔子的一个人。

康有为又写了《大同书》。《大同书》也不是象有些人瞎吹的那样，是一部什么“不平凡的天才”著作，只不过是拾取有关思想资料，加上他自己的推想，拼凑成一个空想的“大同世界”图案。他认为人世间是个大苦海，贫贱人有苦，富贵人有苦，连帝王也有苦，要把这个大苦海，变为“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极乐世界。康有为害怕资产阶级革命的

“铁血之苦”，更害怕当时世界上已经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铁血之苦”，想乞灵于人的“本性”，发挥“不忍之心”，让人们互相携手，互相拥抱，来消灭革命的铁和血，走向“大同”，把被压迫阶级“同”到地主资产阶级的旗帜下去。这就是康有为梦想的“大同”。毛主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①这条路不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虽然对冲击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实，他尽管把古文经书看作是伪造的，却仍旧把孔子的六经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他只是否定了孔子删述六经的成说，却引伸出孔子是为改革社会政治制作六经的“新”论。他仍然是依靠孔子这个“权威”来进行说教，想把孔子改造为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需要，拿孔子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爬上政治舞台的敲门砖罢了。

可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活动，一开始就是抱住两个最大的封建权威，一个是孔子的理论权威，一个是皇帝的政治权威。资产阶级一出场，就表明了它的软弱性、不彻底性，以及和封建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和皇帝，到十九世纪末年，本来已是两具封建僵尸，康有为却想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来改造这两具僵尸，然后借用他们的旗号，演出历史的新场面，结果是失败了。他后来保皇、复辟，连自己也变成了封建僵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被人们“永定为复辟的祖师”，决不是偶然的。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〇页。